



尉繚子
吴子

国学经典

中州古籍出版社

05
国学经典

尉繚子
吴子

徐勇注译

中州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尉缭子 吴子/徐勇注译. —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2010. 1

(国学经典)

ISBN 978 - 7 - 5348 - 3283 - 3

I. ①尉… II. ①徐… III. ①兵法 - 中国 - 战国时代
②尉缭子 - 译文③吴子 - 译文 IV. ①E892. 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00137 号

出版社:中州古籍出版社

(地址: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450002)

发行单位:新华书店

承印单位:郑州市毛庄印刷厂

开本:640mm × 960mm 1/16 **印张:**12

字数:145 千字 **印数:**1—5 000 册

版次:2010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1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尉繚子 吳子

目录

尉繚子

前言	9
----	---

卷第一

天官第一	39
兵谈第二	41
制谈第三	45
战威第四	50

卷第二

兵权第五	57
守权第六	61
十二陵第七	63
武议第八	64
将理第九	70

卷第三

原官第十	73
------	----

治本第十一	75
战权第十二	78
重刑令第十三	80
伍制令第十四	81
分塞令第十五	82

卷第四

束伍令第十六	85
经政令第十七	86

料敌第二 _____ 167

治兵第三 _____ 172

卷 下

论将第四 _____ 179

应变第五 _____ 183

励士第六 _____ 188



尉繚子

我国是一个古代军事文化极为发达的国度。在几千年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在这方古老神奇的土地上，发生的战争难以数计，涌现的军事家灿若群星，形成的兵书、战策卷帙浩繁。我国古代军事理论的基础，就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奠定下来的。

春秋战国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时期。在这一历史时期内，虽然列国纷争，战事频繁，但学术文化却十分发达，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兵家是当时各家文化中一个重要的学术派别。当时著名的兵家人物，首推孙武，其下则有司马穰苴、吴起、孙臧、尉繚等人。而这一时期最著名的兵书则有《孙子》、《吴子》、《司马法》、《六韬》、《尉繚子》等。其中《尉繚子》一书价值很大，而研究却很不够。直到1972年《尉繚子》竹简的残卷出土后，对《尉繚子》的研究才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一、《尉繚子》的成书时代和作者

《尉繚子》是我国古代流传下来的一部著名兵书，是研究先秦哲学思想、军事思想和军事制度的重要典籍之一。《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和《宋史·

艺文志》等对该书都有著录。南朝学者，特别是唐宋时期的许多学者，都在自己的作品中对该书有所摘引或评论。北宋神宗元丰年间，《尉繚子》和《孙子》、《吴子》、《司马法》、《六韬》、《黄石公三略》、《李卫公问对》一起被编入了《武经七书》，作为必读的军事教材。但自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怀疑其为伪籍以后，虽也有学者仍相信《尉繚子》“多存古制”、“亡可疑者”，是“战国谈兵者”所著（参见明代宋濂的《诸子辨》和胡应麟的《少室山房笔丛》，以及近人吕思勉的《先秦学术概论》）。然而数百年来，它在许多人的心目中却变成了一部伪书。如“郑樵讥其见名而不见书，马端临亦以为然”（《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清代姚际恒说：“《尉繚子》……其首《天官篇》与梁惠王问对，全仿《孟子》‘天时不如地利’章为说，至《战威章》则直举其二语矣。岂同为一时之人，其言适相符合如是耶？其伪昭然。”（《古今伪书考》）清人姚鼐也说：“尉繚之书……盖后人杂取苟以成书而已。”（《惜抱轩全集·文集·读司马法六韬》）近人钱穆则怀疑：“其殆秦宾客之所为，而或经后人之麁乱者耶？”（《先秦诸子系年·尉繚辨》）而张心澂《伪书通考》、金德建《司马迁所见书考》、黄云眉《古今伪书考补证》等书，甚至直斥《尉繚子》为“伪物”。由于学术界多年来的错误认识，使《尉繚子》一书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和应有的评价。

1972年在山东省临沂银雀山一号汉墓中与其他兵书一起出土了《尉繚子》竹简的残卷，经竹简整理小组整理，残简释文刊登于《文物》1977年第二、第三期，其内容与今本及《群书治要》所节录的《尉繚子》基本相同，这就使伪书之说不攻自破了。此后，一些研究《尉繚子》的书籍和文章陆续发表，从新的角度对这部古兵书进行了评估。其中，关于《尉繚子》的成书时代和作者，是这些论著集中讨论的主要问题之一。总的来讲，可以概括出两种主要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该书的作者尉繚是梁惠王时代的人，《尉繚子》成书于战国

中期的魏国（我们简称这种观点为“梁惠王时人说”），其根据是今本《尉缭子》首篇《天官第一》中有“梁惠王问尉缭子曰……尉缭子对曰……”的记载。另一种观点认为，该书的作者尉缭是秦始皇时代的人，《尉缭子》成书于战国晚期的秦国（我们简称这种观点为“秦始皇时人说”），其根据是《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有“十年……大梁人尉缭来，说秦王曰……”的记载。

除了这两种主要观点之外，学术界尚有若干其他说法，需要首先予以简要辩驳。因为出土竹简的银雀山一号墓，已被考古工作者判定为汉武帝初年的墓葬，有人即以此作为《尉缭子》作成与传世的时间下限（参见《尉缭子注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等）。我们认为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因为：第一，西汉著名的文学家贾谊在其所作的《陈政事疏》中，说过“夷狄征令，是主上之操也”的话。宋人王应麟指出此句中“主上之操也”几个字“语出《尉缭子》”（《困学纪闻》），如果王应麟之说正确的话，那么贾谊此前即已读过《尉缭子》一书，而贾谊著《陈政事疏》要早于汉武帝即位三四十年。第二，从银雀山出土的《尉缭子》等兵书，都不避汉初几个皇帝的名讳（参见何法周：《〈尉缭子〉初探》，《文物》1977年第2期）。第三，从汉墓中出土的竹简未必即作成于当时或在当时才开始流传，与《尉缭子》同时出土的《孙子兵法》、《孙臆兵法》、《六韬》等，都不是作成于当时，而早在很久以前就广为流传了。第四，楚汉战争的四年，社会动乱；秦统一后的十五年间，大肆焚书，“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史记·秦始皇本纪》）。特别是《尉缭子》书中的论述也与这两个时期的实际情况不符。根据这些材料，我们认为判定《尉缭子》作成和流传的时间，不应受出土竹简墓葬本身时代的局限，而应提前到秦统一之前的战国时代，它是先秦古籍毋庸置疑。

有人还曾提出过“依托说”（参见郭沫若：《十批判书·吕不韦

与秦王政的批判》，群益出版社 1947 年版），即认为尉繚本不与梁惠王同时，只是假托与他答对而著此书。但是这种说法也是难以自圆其说的。如果说是秦汉以后的人假托著书，那么出土的《尉繚子》竹简和我们刚才的考辨已完全排除了这种可能性。如果说是秦始皇时的尉繚假托与梁惠王答对而著书，也不符合逻辑。何法周先生在《〈尉繚子〉初探》一文中对比曾作过一番有力的辩说：“古代假托的伪作确实是有，但一般假托总要假托更古的人……如果说是秦王政十年时的尉繚假托梁惠王时的尉繚而著书，他们本处于同一个时代，这瞒不住任何人的眼睛。这样的假托，还有什么意义？假托一般总要假托更有名望的人。梁惠王与梁惠王时期的尉繚，一个是连吃败仗、连国都安邑都保不住的败国之君，一个是史无记名、后人几乎怀疑其存在的无名之士，假托他们又能抬高《尉繚子》的几何声价？”这是有道理的。

还有的学者猜测历史上有两个尉繚，一个是“战国中期军事家”，另一个是“战国末期秦国大臣”（参见杨宽：《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辞海·历史分册·中国古代史》，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1 年版），断定“杂家尉繚，非梁惠王时之兵家尉繚”（马非百：《秦集史》，中华书局 1982 年版）。其实这种“两个尉繚说”同“依托说”一样也存在着明显的漏洞，因为无论持哪种观点的人，都无法否定尉繚是大梁人这一明确记载，两人同名在历史上虽不乏其例，但在短短的几十年内，出现两个都叫尉繚的大梁学者，其著作内容又相近，这种戏剧性的过分巧合是令人难以想象的。

我们还是回到对前述两种主要观点的分析上来，由于持“梁惠王时人说”的学者和持“秦始皇时人说”的学者至今都不能说服对方，而他们各自所依据的那条唯一的原始材料，在现存的先秦古籍中又都没有找到任何可以引为直接旁证的记载。因此，他们为了鉴别《尉繚子》的作者和成书时代，都试图从该书所反映的社会背景和时代特点

中去寻求内证。

“梁惠王时人说”者从《尉繚子》书中找出的主要证据是：（一）“作者面对的国家，矛盾重重……民流地废，农战不修，‘人有饥色，马有瘠形’，民无定伍，军无定制，‘武士不选’，贤能不用。这样的国家，只可能是日趋衰落的梁，而不可能是生气勃勃的秦！”（二）“作者面对的国君问题严重。他不仅在思想路线上倾向于‘天官时日阴阳向背’等唯心谬论，而且在政治、经济、军事路线上，也不懂得任地、制民的富国强兵之道……这个人，只有可能是败国之君梁惠王，而不可能是‘统一中国’的秦始皇！”（三）“书中引证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也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从时间顺序上看，只引证到战国前期的吴起为止……从引证的历史事件看，唯独吴起以法治军、与士卒同甘苦而‘天下莫当’的事迹最多最详，其中特别是两次提到了‘吴起与秦战’这一富有历史特征的史实。”（均见何法周：《〈尉繚子〉初探》，《文物》1977年第2期）（四）“尉繚在本书中，不断地对‘世将’提出严厉的批评，正是正确地反映士人向贵族争夺政权的战国早期时代背景。”（郑良树：《竹简帛书论文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

“秦始皇时人说”者从《尉繚子》书中找出的主要证据是：（一）“战国时代战争投入的兵员和持续的时间，在早、中、晚期是有明显差别的。《尉繚子》反映了战国晚期的战争规模。”（二）“《尉繚子》体现了战国晚期独有的以仁义为本的战争观。”（三）“1974年发现的秦陵兵马俑军阵，是战国晚期战场情况的写照，它的情况往往能与《尉繚子》所述互相吻合。”（四）“《尉繚子》……记有许多军制条令，往往能与《商君书》和云梦秦简的精神相呼应，证明其作者应与秦有很密切的关系……根据文献记载，当是秦始皇任为国尉的大梁人尉繚。”（均见龚留柱：《〈尉繚子〉考辨》，《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83年第4期）

显然，争论双方所提出的这些理由，除个别问题外，都是持之有

故的。但是，他们对于对方提出的理由，却都不能给予全面而有足够说服力的反驳。这个矛盾现象应该怎样解释呢？我们遍集有关史料并经过反复分析后发现：如果把现有的各种历史记载联系起来考察，上述两种观点实际并不矛盾。也就是说，与梁惠王答对的尉繚和在秦始皇十年由大梁入秦的尉繚本是同一个人。因此，我们认为，在没有发现新的可靠证据之前，对仅存的关于尉繚事迹的两条原始记载，根本不可以也不应该去执意否定其中的任何一条！

既然在今本《尉繚子》首篇中有梁惠王问尉繚子的话，那么我们首先就应对梁惠王的有关史料作一番认真的考证和探究。梁惠王名罃，于周烈王七年（前369年）继位，即史书中所说的魏惠王，因其在位期间将魏国的都城由安邑（今山西省夏县西北禹王村）迁到大梁（今河南省开封市），所以又称为梁惠王。关于梁惠王的纪年即其在位的时间，史料记载有所不同，甚至司马迁《史记》本身的记述也大相径庭，现分别列举并加以考辨。

《史记·魏世家》记载：“三十六年，是岁，惠王卒，子襄王立。”《赵世家》、《六国年表》的记述与《魏世家》同，即认为梁惠王在位仅36年，卒于公元前333年。

《史记·秦本纪》则记载：“武王元年，与魏惠王会临晋。”据万国鼎《中国历史纪年表》（中华书局1978年版）换算，秦武王元年为公元前310年。《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载：“宣王七年，与魏王会平阿南。明年，复会甄。魏惠王卒。”《史记·孟尝君列传》也记有：“宣王七年，田婴使于韩、魏，韩、魏服于齐。婴与韩昭侯、魏惠王会齐宣王东阿南，盟而去。明年，复与梁惠王会甄。是岁，梁惠王卒。”据万国鼎《中国历史纪年表》换算，齐宣王八年为公元前311年。而齐国使用的历法为“周正”，以夏历十一月为岁首，秦国使用的是“颛顼历”，以夏历十月为岁首，所以实际上《史记·秦本纪》、《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史记·孟尝君列传》、《史记·魏世家》、《史记·赵世家》、《史记·六国年表》的记述均与《史记·魏世家》同，即认为梁惠王在位仅36年，卒于公元前333年。